

關老爺遊蒙藏——從院藏雙幅 關公唐卡談藏傳佛教中的關公 信仰

■ 鍾子寅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此處所引為《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所載的一則關帝廟對聯。¹在該回中，關公於荊州當陽玉泉山受老僧普靜感悟皈依佛教，其後顯聖護民，鄉民感其德而建廟致祭。「赤帝」典出劉邦傳說為赤帝之子斬白蛇（白帝之子，指秦朝）起義，在此指漢室。這副對聯點出了關公在世人心中的形象：無論是外貌的赤面、騎赤兔馬、持青龍偃月刀，或是匡扶漢室（無忘赤帝）、忠肝義膽（不愧青天）的志業與人格。

關公信仰在臺灣相當盛行，國人對於三國歷史人物關羽（?-220）成為道教關聖帝君、佛教伽藍護法，相信不會太陌生；但信仰藏傳佛教的蒙族與藏族也拜關公，並存有關公主題的唐卡，大多數人應該會感到驚訝吧！



在本院收藏中有兩幅以關公為主題的唐卡，依據典藏資料，為民國七十年（1981）日人原照雄先生所捐贈。（圖1）從畫風、用筆與尺寸推斷，此兩幅應是出自同個作坊的一組唐卡。兩幅主尊皆描繪關公，紅臉美髯、單鳳眼、臥蠶眉，頭戴青巾，身著鎧甲，外罩飾有五爪龍紋的綠袍，頭後有頭光；脅侍兩位，面白而雙手捧官印者為關公之子關平（?-220），面黑虬髯者為周倉。上方虛空處主要還有大威德、六臂大黑天、閻摩、吉祥天母、財寶天王等藏傳佛教的本尊或護法，下方中央為皮鎧甲護法；在主尊前方擺有供桌，桌上供有鼎式爐、燭臺、插有靈芝的觚形瓶所組成的五供器以及法輪、雙魚、盤長結等八吉祥。兩幅主要不同處為：一幅關公傲然而坐，周倉持青龍偃月刀而立，赤兔馬由馬使爺（臺灣關廟對赤兔馬馬伏的尊稱）牽引；另一幅關公自持青龍偃月刀騎乘赤兔馬，周倉改執旌旗，畫中不見馬使爺（詳見圖1配置圖）。

依筆者管見，在北京雍和宮、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等收藏、以及文物商 Rossi & Rossi 的舊藏中（圖2~4），也可見類似院藏此組唐卡中的關公坐像唐卡。其上方或改搭配格魯派創立者宗喀巴（Tsong kha pa, 1357-1419）及兩大弟子賈曹傑（rGyal tshab rje, 1364-1431）、克主傑（mKhas grub rje, 1385-1438）三尊像、或予以省略，下方或為馬使爺牽引著赤兔馬、或僅有供桌；但多有捧官印的關平以及手持青龍偃月刀的周倉。有些還多了兩位脅侍，一位為頭戴烏紗帽、持笏的文官，面容較老；一位為穿盔甲的年輕武將，

手持寶劍。比對山西解州等關帝廟之配置，此文官為王甫（?-222），武將為趙累（?-220）。

關平、周倉、王甫與趙累四人之中，周倉並不見於正史，當是演義中的人物。依據史實：趙累與關羽、關平父子同時被俘，王甫則於兩年後隨劉備征吳戰敗而死。²此四人於唐卡中脅侍關公，乃根據演義的改編。在《三國演義》中，隨軍司馬王甫先向關公推薦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守荊州，遺憾的是並未為關公所採用，才有後來的「大意失荊州」敗走麥城。之後趙累與關公父子一起突圍，死於亂軍之中；另一方面王甫與周倉留守麥城，在得知關公父子遇害之後，王甫大驚墮城而死，周倉自縊而亡；連赤兔馬也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可以說：此四人（及赤兔馬）被選作脅侍，正是演義中他們同關公一起殉難之故。在人物塑造上，也多據演義而來：關平為十八歲習武少年；周倉「板肋虬髯」、「面黑長身」；趙累多於軍前奔走，為年輕將軍；王甫則似個謀臣，故為較有年紀的文官。³

比對這幾幅作品，無論整體佈局、或關公坐姿等細節，有相當雷同，呈現出依粉本、模組化構圖的特徵。

關羽到關公——唐到清初漢地關公信仰的發展

論者在談論關公信仰早期發展時，最常提到的文獻為唐代董挺（?-812）所撰〈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802）。廟記中提到一則故事：南朝陳光大年間（567-8）天台宗智顛（538-597）到玉泉山發展道場，關羽之靈顯現表明捨地並助建僧坊的意願，於是「萬壑震動、風號雷繞」，建廟之材悉



配置圖

1. 大威德金剛
2. 六臂大黑天
3. 閻摩
4. 吉祥天母
5. 財寶天王
6. 關公
7. 關平
8. 周倉
9. 皮鎧甲護法
10. 紅幹事（皮鎧甲護法之眷屬）
11. 紅面女（皮鎧甲護法之眷屬）



圖1 | 清 18世紀末~19世紀初 關公唐卡組 普贈C25-70、C24-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配置圖

1. 白傘蓋佛母
2. 大威德金剛
3. 六臂大黑天
4. 閻摩
5. 吉祥天母
6. 財寶天王
7. 關公
8. 周倉
9. 關平
10. 馬使爺（馬夫）
11. 皮鎧甲護法



圖2 | 清 19世紀 關公唐卡 Rossi & Rossi舊藏 作者攝於2006年



圖3 | 清 19世紀 關公唐卡 雍和宮藏 作者攝於2007年



圖4 | 清 19世紀~20世紀初 關公唐卡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編委會，《雍和宮唐喀瑰寶》，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1998，頁143。

無匱乏。這本是在陳述關公的靈驗事蹟，但後來成了關公佛教化的原型。在北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張商英（1043-1122）所撰的〈重建關將軍廟記〉中，這則故事被改寫為：關羽之靈先現種種怪異可怖之姿愆惑智顛，在智顛偈語感悟後，關羽乃請求智顛攝受，於是智顛授關羽父子五戒，關羽父子乃捨地為智顛建玉泉寺。⁴在桂林龍隱岩釋迦寺的崖壁原刻有智顛、關公、關平三尊像，紀年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現僅存題記，但可推測三尊像當是智顛置中，關公父子脅侍。⁵由此可知最遲在宋初，智顛授關公戒律使關公成為佛教護法的故事已經成形；而這個故事最終再度被改寫為《三國演義》中關公於玉泉山受普靜感悟的故事。

然而，我們不應該將這則故事視為唐宋時期關公信仰的主要面貌。很顯然地，其敘

事呈現了典型佛教吸納「外道」為護法的套路。要更理解關公信仰的全貌，更多需要從國家祀典、帝王敕封、以及道教經典體系等面向來交叉觀察。

唐代封輔佐周朝興起的姜太公為武成王，儀典同孔廟（文宣王廟）規格。德宗建中三年（782），禮儀使顏真卿（709-785）奏請依孔廟配祭亞聖、十哲等之例，以古今名將六十四（一說七十二）人配祭於武成王廟，「蜀前將軍壽亭侯關雲長」列為其中。⁶武成王廟立於兩京、天下各州，在全國範圍內有其影響力，不過關公僅是數十位配祭中的一員，與其同時代的周瑜（175-210）、陸遜（183-245）、鄧艾（195-264）、張飛（?-221）、呂蒙（178-220）等都在其中，諸葛亮（181-234）更是名列其前的「十哲」之中。

宋朝皇帝崇信道教。北宋中晚期，朝廷對各地混亂的神祇封號逐漸建立起統一制度，並在此大環境中開始給予關公封號：哲宗紹聖二年（1095）先賜額「顯烈」於當陽玉泉的關廟，徽宗崇寧元年（1102）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1108）封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加封為「義勇武安王」並「從祀武成王廟」。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亦續封「壯繆義勇王」、「英濟王」等。⁷其中「義勇武安王」或許是當時最流行的封號。內蒙古黑水城發現一幅關公像版畫，其上就題寫「義勇武安王位」（圖5）；版畫邊框還刻寫「平陽府徐家印」，可知出於山西臨汾。此幅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關公圖像。

在元明時期的文獻中，例如無名氏雜劇〈關雲長大破蚩尤〉、收入《正統道藏》（1445年刊印）的《道法會元·地祇馘魔關元帥祕



圖5 金 關公像 俄羅斯冬宮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取自K. F. Samosyuk. *Buddhist Painting from Khara-khoto, 12-14th Centurie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St. Petersburg: 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 2006. fig. 53.

法》、抑或王世貞（1526-1590）《弇州續稿》等，尚有龍虎山第三十代張天師張繼元派遣關公斬蚩尤復解池（解州鹽池）、關公因此得到宋徽宗封「崇寧真君」的故事。由於宋朝當代史料未見宋徽宗封關公「崇寧真君」一說，過去論者多將此單純視為道教人士或戲曲家所編造、搬演。然根據畢沅（1730-1797）《續資治通鑑》：宋徽宗時期山西解州鹽池曾潰敗長達八年，影響朝廷鹽稅收入甚劇。崇寧四年（1105）五月徽宗賜張繼元

號「虛靖先生」，六月即「修復解池，百官入賀」，推測張繼元確實參與了「降伏」解池妖怪（蚩尤）一事，很可能後來在道教龍虎山一系的推衍下，將關公與此事件聯繫了起來。據南宋末郝經（1223-1275）〈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⁸

蒙元初抑道教，然帝師八思巴（Phags-pa, 1235-1280）以白傘蓋為「鎮伏邪魔護安國刹」，每年舉行白傘蓋遊皇城內外以「祓除不祥」，卻以關公為監壇護法。⁹除再次呈現「外道」作為藏傳佛教之護法外，也從另一側面顯示關公信仰在漢地已有相當程度的流行。而隨著三國故事在蒙元時代的發展，周倉逐漸成為關公身旁具有鮮明特色的隨從，進而影響了關公圖像。在山東東平華嚴洞佛教造像群入口的關公坐像兩旁，就有關平與持大刀の周倉脅侍，其造像碑紀年明成化十九年（1483）；而一幅收藏在瑞典隆德文化史博物館（The Museum of Cultural History, Lund）的道教眾神繪畫，關公與玄天上帝一組，其旁也立著持大刀の周倉。¹⁰明代晚期，帝王對關公的敕號又再提升：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先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萬曆四十二年（1614）再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謝肇淛（1567-1624）《五雜俎》（1616年刻本）：「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按：即關公）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¹¹由此可知道明代晚期關公信仰之盛。

清朝滿族皇族興起於關外，受漢族影響，除喜讀《三國演義》，也非常崇奉關公。皇太

極（1592-1643）於盛京（瀋陽）即建關帝廟，軍隊出征或凱旋均有儀式，將其視為戰神。順治（1638-1661）入關後復建廟於北京地安門外，每年致祭。順治九年（1652）敕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三年（1725）更進一步追封關公祖宗三代，增春秋二祭，並授其後裔五經博士世襲承祀。¹²由於對關公尊崇已同孔子，以至於地方官員還上奏，請將前朝留下的武成王廟中的關公，從陪祀位置移去關帝廟，在無關帝廟之地方則改列中與武成王並坐。¹³

關公進入藏傳佛教體系

據噶瑪噶舉派的說法：五世噶瑪巴（Karma pa De bzhin bshegs pa, 1384-1415）從漢地返回時將關公迎回藏地，關公成為噶瑪巴的護法，稱為「噶瑪漢神」。然而，關公受到更廣大藏傳佛教信徒的崇拜主要在清中期以後格魯派中盛行，乾隆皇帝時的國師、格魯派三世章嘉·若必多吉（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及其弟子三世土觀·洛桑卻吉尼瑪（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1737-1801）等扮演了關鍵角色。

三世章嘉

三世章嘉撰寫〈關老爺祈供法〉（Kwan lo ye'i gsol mchod bzhugs so），可說是格魯派將關公納入藏傳佛教護法體系之始。據儀軌末三世章嘉自言：其乃受達擦（rTa tshag）活佛之請而寫。據考此為七世達擦·洛桑貝堅（rTa tshag Blo bzang dpal rgyan, 1708-1758），其於1748年受三世章嘉推薦任雍和宮住持，故此儀軌約完成於1748-1750年。依據儀軌，行者先「冥想自己為密集、勝樂、大威德等

金剛本尊中的任何一個」，並祈請關公「請做瑜伽聖法修練之助伴，息滅所有違緣而助順緣無餘成，使佛法廣弘國境平安，瑜伽師徒及獻資之施主等無論住家、外出、做事皆平安」。¹⁴

三世章嘉傳記中記載了關公對他的幾次護持。一次為乾隆元年（1736）章嘉自拉薩回北京途中，於四川襄陵夢見一紅臉大漢，願作其保護者。此大漢即關公。另一次則是章嘉生病，經占卜於幻境中見許多蜘蛛擁聚其身旁，後有一威風凜凜紅臉大漢持寶劍將蜘蛛趕往它處。後於夢中得知此紅臉大漢即北京前門城外關帝廟之關公。¹⁵

三世土觀

繼三世章嘉與七世達擦之後，三世土觀積極推展關公信仰。在〈三界伏魔大帝關雲長之歷史和祈供法·激勵事業雨流之雷聲〉（Kham s gum bdud 'dul rgyal chen bKwan yun tshang gi lo rgyus dang gsol mchod bya tshul 'phrin las char rgyun bskul ba'i 'brug sgra zhes by aba bzhugs so）中，土觀首先把關公受智顛感悟的傳說寫入：

（關公去世）四百年後，有位守持中觀學說的智者大師至該地靜休時，關公幻變為大蟒蛇，繞山峰三圈，並引來屬魯神之族的千萬軍兵，大師入於三摩地，終不為所動。大師向其講述佛教因果法，關公感悟，應諾自己將作為佛教密宗護法神之化身。

關於關公是哪一尊護法神的化身，土觀提出姊妹護法（案：即院藏雙幅關公唐卡下方所描繪的皮鎧甲護法）、降魔金剛、尊贊神等說法，並推崇第一種、即姊妹護法之說

法。在祈供儀軌部份，相較於三世章嘉的儀軌，土觀的儀軌對於關公形象有較詳細的描述。因與本文所關心的圖像有關，茲引於下：

前面之珍寶黃金座上，層層鋪設各種錦緞坐墊，其上坐著統轄所有地方之守護者三界伏魔雲長大帝君，形體紅色面容端莊，鬚鬚如熾，長眉顯威嚴，傲然之態，雙手置大腿。身著燦爛珍寶黃金甲，身披各種細網所做的大氅，腰勒鑲嵌寶石之黃金帶，頭戴羽毛裝飾之絲巾寶冠。

其後還註解說明：此（儀軌）關公乃按漢地戲中登座之形象而寫，另有騎紅馬拿大刀之形象，亦可按此迎請。¹⁶由此儀軌可知關公有坐姿與騎馬姿二種。

土觀於文末自稱「文殊大皇帝賜封靜修禪師」，其得此封號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為造此祈供儀軌之年代上限。

蒙區的傳播

由於三世章嘉與三世土觀出身、活動於甘肅、青海、京師（北京），三世章嘉更是清廷所封掌管內蒙教務之最高喇嘛，藏傳佛教的關公信仰還影響了蒙區。在內蒙著名學者察哈爾格西·洛桑慈成（Cha har dge bshes Blo bzang tshul khri ms, 1740-1810）文集中，也有〈護教大帝關老爺祈供法·所願普施〉（bsTan srung rgyal po chen po bKwan lo ye'i gsol mchod 'dod don kun stsol bzhugs），自言據土觀儀軌增添；另駐京呼圖克圖之一的三世阿嘉·洛桑絳央嘉措（A kya Blo bzang 'jam dbyangs rgya mtsho, 1768-1816），也受喀爾喀蒙古濟農貝子索南旺加多杰之請，撰有〈東方支那戰神大帝關老爺前供神飲法·招隨願



圖6 清 19世紀 十一面觀音曼荼羅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編委會，《雍和宮唐喀瑰寶》，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1998，頁35。



圖7 清 19世紀 葉衣佛母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唐喀瑰寶編委會編，《雍和宮唐喀瑰寶（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28。

之鉤〉（dBang phyogs tsi na'i yul gyi dgra lha'i gtso bo rgyal chen bKwan lo ye la gser skyems 'byal tshul 'dod rgya 'gugs pa'i lcags kyu zhes by aba bzhugs）。¹⁷

唐卡中作為配角的關公

除了前述以關公為主尊的唐卡外，我們還可以在以下幾幅雍和宮所藏的唐卡中找到作為配角的關公：

〈十一面觀音曼荼羅〉（圖6）：

畫幅上方為阿彌陀佛、大威德、馬頭明王、綠度母、葉衣佛母，下方為六臂大黑天、吉祥天母、財寶天王、格薩爾王、關公。

〈葉衣佛母〉（圖7）：

畫幅上方為宗喀巴、龍尊王佛、金剛薩埵；下方為六臂大黑天、白哈爾（Pe har）、關公、四面大黑天、上龍金剛（Zhang blon rdo rje，藥師佛之護法）。

〈綠度母〉（圖8）：

上方中央為釋尊，左右為蓮師、三世章嘉、文殊、十一面八臂觀音；下方中央為吉祥天母，左右為閻摩、財寶天王、白哈爾、關公。

〈白財神〉（圖9）：

上方中央為宗喀巴，其右側喇嘛手持寶瓶，雙肩處有劍與經書，從其帽子等法相及畫風年代，推測三世章嘉，¹⁸ 相對另一側喇嘛



圖8 清 18世紀末~19世紀 綠度母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編委會，《雍和宮唐喀瑰寶》，頁67。



圖9 清 18世紀末~19世紀初 白財神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編委會，《雍和宮唐喀瑰寶》，頁125。

手持經書，推測為六世班禪（1738-1780）；下方右側為關公，左側一著綠袍騎白馬文官，應該為源自道教的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明代之後常與關公相對出現。

〈黑鐵匠護法〉(mGar ba nag po) (圖10)：

此尊為寧瑪派最高世間護法具誓善金剛 (rDo rje legs pa) 的大臣，以騎褐色山羊、手持人皮氣囊為特徵，為鐵匠行業之守護神。上方為阿彌陀佛、馬頭明王、蓮花生大士，為蓮花部之法、報、化三身。下方右側屋宇內，明顯是關羽中坐，關平（手舉官印）、周倉（手持關刀）脇侍而立，其前為馬使爺牽著赤兔馬；另一側屋宇內，中坐者留著鬚

鬚，書生樣貌，左右兩為一男一女僮僕，女僕手持書函，男僕似拿布匹。其前也有一馬伏牽著白馬。此中坐書生推測可能還是文昌帝君，雖然其更常見的隨從為天聾、地啞，分別手持紀錄流年的簿冊與筆。畫幅下方中央還有一尊，身著官服樣，兩眼圓瞪，右手拿寶珠，左手持如意。依筆者管見，此尊也並非是藏傳佛教中的尊格，很可能也是來自道教，然其確切尊格頗讓筆者猶豫。考量此幅主尊黑鐵匠護法、關公都具有財神尊格，主掌考試的文昌代表官運，亦類似財神，中央此尊推測亦有財神尊格，其兩眼圓瞪，或許為武財神趙公明。



圖10 清 19世紀 黑鐵匠護法 雍和宮藏 取自雍和宮唐喀魂寶編委會編，《雍和宮唐喀魂寶（上）》，頁96。



圖11 蒙古 20世紀初 格斯爾可汗（關公） 烏蘭巴托蒙古佛教藝術中心（Mongolian Institute for Buddhist Art）藏 取自 *Dschingis und Seine Erben: Das Weltreich der Mongolen*. Munich: Hirmer Verlag, 2005. PL. 421.

結論——以雍和宮為紐帶

從以上文獻與美術遺品雙方面的考察可知：明晚期「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清時滿族皇帝更予以尊崇。首位為關公造供養儀軌、而將關公信仰帶入藏傳佛教的三世章嘉成長於藏漢交融之地的甘肅藏區，其對漢人崇信的關公當不陌生，我們甚至從其傳記可知三世章嘉將關公視為其個人的護法。

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章嘉主持將雍正皇帝舊邸改為藏傳佛教寺廟，名曰「雍和宮」，使其成為西藏以外（即蒙古、青海、甘肅等地）藏、蒙僧人留學之地。大約於1750年，三世章嘉受時任雍和宮住持的七

世達擦的請求，撰寫〈關老爺祈供法〉，用了漢族對關公的暱稱「關老爺」，這大大影響了後來蒙藏族均以此暱稱稱呼關公。三世土觀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奉召進京，並協助三世章嘉管理在京喇嘛事務，居住於雍和宮土觀札倉（乾隆皇帝於1765年賜建）；其之後造〈三界伏魔大帝關雲長之歷史和祈供法·激勵事業雨流之雷聲〉，「三界伏魔大帝」則是源自明萬曆皇帝的封號。在此兩位格魯派高僧的推動下，自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可以說正是以雍和宮為紐帶，關公信仰開始在北京、蒙古等地區的格魯派中興盛起來。本文所述與關公有關的唐卡較多保存在雍和宮，正應證了此史實。

院藏此雙幅唐卡組背景山石畫法近清宮作坊之唐卡，特別是與前述雍和宮所藏〈白財神〉（圖9）相當近似，推測為北京地區唐卡作坊之作品，且很可能與雍和宮有關。此雙幅組唐卡上方所出現的大威德、六臂大黑天等五尊，與雍和宮東配殿（亦建於乾隆九年）的五尊全然相同，可以說絕非偶然。¹⁹

在關老爺遊蒙藏的歷程中，還有個有趣的故事：即藏族將其視為史詩英雄格薩爾王，蒙族稱其為「格斯爾可汗」（即藏族之格薩爾王）。²⁰ 蒙古的唐卡中常將關公的紅臉特徵遺忘（圖11），即是因為與格薩爾混淆之故。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華正書局，1994），頁618。
-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先使硃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參（西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二·孫權傳〉，轉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sanguozhi/47/zh>（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王甫）隨先主（即劉備）征吳，軍敗於猇歸，遇害。」參（西晉）陳壽，《三國志》，卷45，〈蜀書十五·鄧張宗楊傳〉，轉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sanguozhi/45/zh>（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頁229、224、591、610-617。
- （唐）董挺，〈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收入《全唐文》，卷648；（北宋）張商英，〈重建關將軍廟記〉，收入《全宋文》，卷2231。以上轉引自蕭登福，〈關帝與佛教伽藍神之關係，兼論關帝神格屬性應歸於道而非佛〉，《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20期（2013.12），頁67、69。
- 溫玉成，〈「關公顯聖」與佛教造像〉，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1996），頁159-161。
- （宋）歐陽修、宋祁編纂，《新唐書》，卷15，〈禮樂志五〉，轉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25319>（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
- 相關史料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卷44，〈禮二十〉；（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胡琦，《關王事跡》，卷3；（清）趙翼，《陔餘叢考》，卷35「關壯繆」條也有相同記載。轉引自：王見川，〈唐宋關羽信仰初探〉，《圓光佛學學報》，6期（2001.12），頁112、118；胡小偉，〈三教圓融與關羽崇拜〉，收於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91。
- 參見胡小偉，〈三教圓融與關羽崇拜〉，頁391-392、395、397-398；（宋）郝經，《陵川集》，卷33，轉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70307>（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
- （明）宋濂，《元史》，卷77，〈祭祀六〉，轉引自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85%B3%E5%8F%B2/%E5%8D%B7077>（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
- 張總、吳緒剛，〈山東東平華嚴洞造像〉，《文物》，2001年9期，頁66-67；Schuyler Cammann, "A Ming Dynasty Pantheon Painting," in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 18 (1964): 41.
-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15，轉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821002>（檢索日期：2019年3月15日）。
- 清朝崇奉關公的情況，參見張羽新，〈清朝對其保護神關羽的崇奉〉，《出土文獻研究》，1998年2期，頁165-190。
- 見本院藏「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鎮守宣化府等處地方副將充總兵李如柏奏」之奏摺（故宮010666），見林夫人主編，《赤壁與三國群英形象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172-173。
- 民族圖書館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上）》（成都：四川民族，1984），頁493；才讓，〈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中國藏學》，1996年1期，頁80-81。
- 三世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等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130、145-146。
- 民族圖書館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頁355；才讓，〈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頁82-85。
- 民族圖書館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中）》，頁10；才讓，〈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頁85-87。
- 雍和宮所藏一幅三世章嘉唐卡有相同法相，見雍和宮唐喀瑰寶編委會編，《雍和宮唐卡瑰寶（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10。
- 謝繼勝主編，《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下）》（上海：上海書畫，2010），頁909。
- 藏族對關公的「誤讀」歷來討論頗多，近期研究可參見：加央平措，〈關帝信仰在藏傳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薩爾崇拜的文化現象解析〉，（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0）；在蒙族的傳播則可見：陳尚龍，〈內格斯爾而外關公——關公信仰在蒙古地區〉，《民族藝術》，2011年2期，頁56-60；董曉榮，〈從北京木刻本《十方聖主格斯爾可汗傳》插圖看蒙古族關公信仰〉，《藏學學刊》2018年1期，頁75-91。